

“对话与未完成: 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笔谈(上)

摘要: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以跨越为特征的边缘性学科,其学科建设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孙景尧的文章通过对国内较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的评述,对该学科在中国的现状表现出一种忧虑:比较文学是否可能成为比较玄学。王志耕以《新编比较文学教程》为例,肯定了比较文学走向现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趋向。徐田秀通过对《比较文学论》的阅读,提出了寻找中国比较文学之“根”的问题。李兰生则从汉语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研究着眼,探讨了实现“中国化”学术理念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学科建设; 教材建设;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3-0344-08

比较文学, 还是比较玄学?

孙景尧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据京沪两地的一些教授学者说,近年出版的有些比较文学教材快成“比较玄学”“比较大学”了。说“玄学”,意思是说他们看不懂,太“前卫”、太深奥;说“大学”,是讲这门学科被说得太宽泛、太包罗万象,似乎比较文学能把人文学科都囊括在内。同时,有些教师反应,新教材不太好讲。学生则说上比较文学课就像是又听了一遍各种新论新说的新文学概论课。当然这些议论仅作参考,但它们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教材应当从学生和学科的实际出发,使原理和方法、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

针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首任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杨周翰教授生前说过:“不仅要介绍比较文学的发展、原理、内容、任务,而且要联系我国实际,指导实践。因为徒然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跃跃欲试,而不提供范例,不提供方法,还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笔者认为,从学生和学科实际出发,应紧扣学科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而非贪全求玄、浅入深出。王向远和梁工等教授编写的书,均立专章、专节解析具体研究个案,或讲解中外文学基本特点,对学生是比较有益的。陈国栋、大孟等不少老朋友从事比较文学这门课的教学都有 20 年了,我和他们有一点共同的感受是,比较文学课总是学生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学生们都认为,学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再学比较

文学,能使自己打开视野,增加新认识和新方法。这给了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在中文和外文两系的现有教学课程设置和学生学习的整个环节中,怎样结合我们学科,将比较文学定位好?大家清楚,现有的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专业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和文学概论),是没有一门课系统和专门讲授文学研究具体方法的,尤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怎样让学生能与时俱进、并能如马克思所说的“做世界的公民”那样地认识和研究中外文学文论,是极需我们考虑的。而比较文学的性质特点,又恰恰具有这一优势,它是具全球化视野的文学研究学科。所以,我们的教材若能在这方面予以切实的关照,对学科在高校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对我们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将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这门课也将更受学生的喜爱、兄弟学科的欢迎和社会更大程度的认可。

从学科的实际出发,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当将有益的新理论、新理念消化融入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使之为比较文学研究添翼,而非是化解比较文学而成一部新文论的汇编。一位研究文论的专家学者,可以编写一本文论著作,甚至是一部文艺学的力作,但它们绝不是一部比较文学教材,甚至也不是一本比较诗学著作。从文艺学到比较诗学或比较文学,这中间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比较文学或比较文论的

研究,一个并非等同于诗学或文艺学的又一天地。我记得编写《比较文学》一书就遇到这个难题,如介绍符号学时,执笔者可以将其概念、原理和来龙去脉讲析清楚,但是将之融入比较文学,则感到很棘手。一方面中西符号学研究成果甚微,缺范例资料,另一方面又未曾作中西符号学、乃至中国符号学的系统研究,更未能将之融入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去。没有这些实绩,不作中西融通,仍然与比较文学“不搭界”。我们的有些教材,如果写成一部比较文学与某某学或理论的专门论著或教材,既可以弥补国内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不足,又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独到的学术功力,也许更有其学术贡献和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只需下功夫去研究去探索去总结,最终能发展出一系列的有关论著与教材。

而将学科实际与学生学习实际结合考虑,处理好学科的公允共识与学科新发展和个人创见的关系,写成一本深入浅出的教材,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教材是越编越厚,运用各种理论来阐述与发挥基本概念和原理,也就越写越多。我不清楚各校是否有那么多课时,也不知道是否讲这么多对学生确实有效。我很欣赏法国比较文学家编写的教材。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学界公认并有影响的教材有:梵·第根的《比较文学》,其中译本不过14万字。50年代基亚的《比较文学》,总共只有9万多字。80年代布律内尔的《何谓比较文学》,算是文字多些,但也就是16万字。而90年代谢菲尔的英文版《比较文学》,则薄薄的109页,译成中文也不会超过12万字。法国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和教材编写历程,其文字定格始终在20万字之内。但这既不削弱他们对比较文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基本知识的传授,也不影响他们对学科新发展、新问题和新思考的评介,可谓简要精当。如谢弗雷的《比较文学》,把比较文学概念、原理和方法,以及早期的各类情况,都放在“定义”“外国作品”和“比较文学史编的得失”三章中去总结与探讨,而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则归为“文学神话”和“艺术形态”两章去评述。一方面精当地评介了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认识发展等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又介绍了标志学科新发展的代表著作并提出了不少须深入研究的新问题。他并没有拉开架子去全面阐述西方当代文论,而是融会了成功并富有填补学科空白的理论

方法,如文学与副文学(paraliterature),文学与非语言表述艺术等,作为进一步“明确文学的界限”的理论方法来阐述其跨学科研究的原理与学理,与此同时又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和新方法。在此基础上,最后集中探讨了新理论对比较研究的规律与方法的各种启示和挑战等。这样的教材,教师有讲头,学生有学头,并且还很有启迪性。

相比之下,我们的有些教材,在有些基本或关键概念或原理的阐释中,非但没有深入的探究,反把与比较文学基本知识或基本原理无太多密切关系的新论写了不少。还有的教材,对传统又公允的共识也显得慎重不够。例如比较文学的跨界特点,有的说是“四个跨越”,有的说是“五个跨越”,还有的说跨民族界和跨学科界“是最为重要的”。也有的强调跨语言界与文化界重要等等。有自己的见解本无可非议。但总要言之有理并前后统一,不犯矛盾悖论的逻辑毛病。有的教材说:“文学研究的视域一旦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就必然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界限”,这话说得太绝对了。因为这一命题的成立,必须基于“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这个前提,但这种情况,事实上少之又少。因为,只有当使用一种语言并恪守一种文化的一个民族自成一个独立地理行政区域时,民族、语言及其文化同国家才相等。通常认为说日语的大和民族就是日本国,而日本文学就既是日本的民族文学,又是日本的国别文学。但事实上,即便是日本文学,它在其文学史上也还存在汉字文学、阿伊努文学等。纵然瑞士这样的小国文学,也由德语区、法语区、意大利语区和莱托-罗马区的文学组成。至于像中国、俄罗斯、美国、印度、英国、加拿大等,则更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况且就是同一民族也有用不同语言写的文学,仅以上了美国畅销书榜的华人作品为例,20世纪30年代就有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50年代黎锦扬的《花鼓歌》,不仅上了畅销书榜,而且还被改编为歌舞剧和电影。80年代黎锦扬又出版了《中国传奇》,包柏漪出版了《春月》,郑念出版了《上海生死劫》,近年来又有《鸿》《神州怨》等作品的问世,其作者都是用英语写作的华人,有些就从未放弃过中国国籍。可见,这一命题缺乏必要的正确前提。

正因此,在其接下来阐释“不跨语言,比较文学研究也可以成立”时,所举的例子无论是加拿大、美

国和澳大利亚的文学同英国文学,还是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汉语文学,固然能说明不跨语言的上述仅跨民族界的文学也可以彼此作比较研究;但它们同时不都表明跨越了民族界限和国家界限的文学,也都没有“就必然跨越了语言”界限吗?我觉得,像这类涉及到学科基本原理的提法,最好还是多参考国外经典专著与教材并多作思考为好。不仅要考虑“自我”,还得顾及“他者”,更需要有比较文学学科所特别强调的全球化视野,从而使自己的结论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当今的,又是历史的和未来的,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法国的基亚到美国的维斯坦因,直到谢菲尔,都认为语言的不同是比较文学研究所必备的视野和要求。在此我想引用谢菲尔的话:“比较文学起步时面临一个其他比较研究所没有遇到的根本问题:当一个完全浸淫于本身文化的人类意识面对着一件代表另一个文化结晶的作品时,将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也就是说,不管是有意或

无意的接触,对我来说,站在我面前的外国人,说的是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永远是外国人。若我不试着去了解他的语言的话,我所听到的只是野蛮人所发出的支吾不可解的声音。问题是,我所面对的外国人的想法也跟我上述的想法一样。除非我能很幸运地用所谓通用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意见,要不然就无法跟他沟通。比较文学者的思考推理重点就是跟相异的人交通,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比较文学研究因此而具有合法的地位。”他最后总结说,比较文学是通过不同时空的语言文化的文学来更好认识他者,同时又从中更好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一根本要求依然如故。所以,我欣赏杨乃乔教授所著教材中的一句话:“跨民族、跨语言与跨文化是连接在一条意义链上的。”这是一个很有价值也很有启迪的见解。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比较文学:走向现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王志耕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文学理论进入20世纪后,以现代主义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整合为标志,而成为一种具有泛学科性质的学问。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比较文学至今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人们提出了许多疑问:比较文学是否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认知体系?比较文学是否是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系统理论?比较文学究竟如何在20世纪的文论大潮中为自己定位?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曾为文学研究拓出广阔视野的学科是否已完成其使命?然而,疑问毕竟是疑问,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足够的论据证明比较文学可以休矣。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着理智的思考。其实,比较文学危机论并非空穴来风,它是20世纪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首先,随着现代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演进,而将本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纳入了自己的视界,在现代文论家看来,文学是批评家的乐园,过去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

——“边际”性——在这个乐园里被消解了;其次,20世纪文论呈现出“泛语言化”倾向,在泛化的语言中,蕴含了整体的文化元素。换句话说,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了整合,这一点我们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最终引出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普罗普的结构神话学、弗莱的原型理论等这一过程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象。而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也在这一文化整合大潮中被“整合”了进去。由此看来,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发生在这种被文论与文化研究的侵蚀之中。

那么,比较文学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面对这一现实应当怎么办呢?当笔者在思索这一问题的时候,读到了张铁夫教授主编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1]。这本书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得出了较好的答案。可以看出,主编的主导思想是:与其将比较文学置于一个久已存在的、被逐渐侵

选择性,外国文学研究的本质为二者设定了合理前提,只有将它们统一起来,才能充分展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科特色,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西学”学理体系。

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还需确立外国文学教学“中国化”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应该具体贯彻在各级教学大纲、课程计划、教材编撰、教学方法之中。以英美文学的教材编撰为例,我们只要翻阅一下许多今天流行的通用教材就可以看出:无论材料的选编、注释的撰写,还是作家作品的评析等等,能够真正体现中国学者独特的审美意识、批评视角和学术趣味的,实在不多。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一些知名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居然可以东拼西凑,剪刀加浆糊似地抄袭英美权威文学选集(如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等)中的作品、作家简介而不注明出处,作为面向中国学生的外国文学教科书,这些教材该注释的地方不注释,不该注释的地方又往往注的不得要领,让人看了摸不着头脑,可它们又偏偏被列入许多大学的考研参考书目中。这种状况亟待改观。

其实,“中国化”问题,不仅仅是外国文学学科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都必须既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又要合理吸取和整合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通过动态的思想交融与互补,使之成为可以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

(作者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 参见 2002 年 7 月 28 日的《比较文学报》。

参考文献:

[1] 张铁夫. 新编比较文学教程[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2] 余虹. 艺术与精神[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 曹顺庆. 比较文学论[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

[4] 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 2001.

[5] 郑振铎. 文学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8.

[6] 维吉尔·毕诺.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Dialogue and unfinishedness: o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

Abstrac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a discipline characterized by its interdisciplinarity, which sets out many problems worth investigating. Sun Jingyao's paper, by commenting on sever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extbooks currently being use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xpresses the author's anxiety whe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will finally slip into Comparative Metaphysics. Meanwhile, Wang Zhigeng, by citing A New Coursebook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ese as an example, affirms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ll tend towards a combination of modern criticism with cultural studies. Xu Tianxiu's essay, based on the reading of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rticulates a strong aspiration after the roo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owever, Li Lansheng's paper, which focuses on foreign literatures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discusses how and why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sinicization should be actualized to feature a scholarly paradigm in such studies.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scipline; textbook construction; sinicization

[编辑: 苏慧]